

皇家亚洲文会 北中国支会研究

◆王毅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皇家亚洲文会 北中国支会研究

◇ 王毅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王毅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11

ISBN 7-80678-418-7

I. 皇... II. 王... III. ①国际组织:文化机构—研究②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 IV. G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1644 号

责任编辑 沈素敏

书籍设计 杨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

王毅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40×965 1/16 印张 27 字数 450,000

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78-418-7/K·74

定价: 40.00 元

序

周振鹤

历史编纂学与历史哲学有点不同,简而言之,前者主要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后者则要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当然两者有时不那么能截然分开,但各司其职的情况是很明显的。或许有人认为建立框架、提出理论、总结规律的工作较为上乘,而整理文献、排比资料、考镜源流的工作略嫌平凡。其实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只是各凭研究者的学术兴趣罢了。虽然历史编纂学是基础性的工作,但须知如果没有坚实的基础,忽略了历史的真面目,则历史哲学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而已。过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是以历史编纂学为自己的工作任务,所以所长傅斯年才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主张。

其实有时在将历史面貌弄清楚以后,历史发展的规律也就展现在其中了。因而“述而不作”也是历史研究的不二法宝,或者我们竟可以大胆地说,在历史编纂学里,“述”字当头,“作”也就在其中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竟然主张著书不如抄书的道理。因为胡乱著书可能误人,^[1]但把不同来源的书分类抄撮在一起,让人看出这些材料其中的内在关系,却是启发思维的一种好方法。顾氏的三大著作《肇域志》、《天下郡国利病书》与《日知录》,前两部规模宏大,就都是抄撮众书而成的,但读者却能从中看出历史发展的脉络来,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所谓著书不如抄书只是一个极端的说法,目的是纠正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并非反对有真知灼见的著书。但由这个说法倒可以申明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性,只要我们将历史原貌复原出来,许多不言自明的道理也就显现出来了。王毅这本《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可以说就是历史编纂学性质的一个样本,其目的就是将

[1] 其实明人的许多胡乱著书的典型也是抄书,而且乱抄一气,还不声明来源,让人误以为是一部首尾一贯的专著。如颇负盛名的《明史纪事本末》,表面上看起来是谷应泰的私家著作,但其实也是拼凑之作。此例可见徐泓《〈明史纪事本末〉的史源、作者及其编纂水平》,载《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2—71页。

西方在华的一个汉学机构的建立与活动全过程展示在读读者面前，而自己基本上不作过多的评论。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传统上称为汉学，近年也有称为中国学的，但我以为还是称为汉学有更强的概括力。最近，汉学史的研究渐渐蔚为一门显学，出了许多专门著作与论文，但是为何要进行这种研究之研究未必人人有相同的看法。有的人或者以为这是光大中国文化的途径之一，因为藉此可以发现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而且其中不乏赞美之词，而这一点正是国人最易陶醉之处。其实汉学史的研究，我以为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为了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不能以自己说了算，也不能以别人说了算，而要相互比照才能得其真。人是看不到自己的面孔的，所以我们必须有镜子来对照，别人的评论也可以看作是一面特别的镜子。我在《正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一文中说，乾隆皇帝是不认识大清帝国的，因为他只知道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因此不肯开放贸易的大门。为什么不认识？因为他不知道西洋人如何看中国。因此对千百年来外国人如何看中国，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的研究，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西方早期汉学家的出现，可以从晚明耶稣会士来华算起。他们用书信与报告、旅行记甚至地图、辞典、语法书向欧洲介绍了一个他们过去从不认识的文化，引起了欧洲好一阵的中国热。正式的汉学研究或许可以法国汉学家雷慕沙 1815 年开设的汉学讲座为开端，延续至今已经将近 200 年之久。这期间西方学者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语言、地理等方面的著作，至今尚未认真梳理过。而且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只有英文著述介绍过来的较多，但也并不全面，其他语种则多付之阙如，或者虽有介绍而水平较差。至于 15 世纪末到 18 世纪的早期汉学家的著作，由于多是所谓小语种或拉丁文著作，了解的人就更少。这只是著作的情况，还有汉学机构的研究也还没有深入地展开。例如对于远东地区最早的汉学机构，即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就根本没有人系统地研究过。这个文会在中国存在了将近百年之久，出版了百余期会报，举行了数百场学术演讲会，创办了在上海很有影响的图书馆与博物院，至今似乎默默无闻，除了 70 岁以上的学者还记得他们中学时代听说过这个学术机构外，青年人就几乎全然不知了。这个文会的会报，除了西方汉学家的文章外，也发表了不少知名的中国学者如王国

维、胡适、蔡元培等人的著述。演讲会则邀请过更多的中国学者发表过演讲，从中可以发现中西学者之间的互动。但与此同时，又不可否认的是，该文会在人文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都居于汉学领域的最上乘，所以未能进入当时杰出的中国人文学者的视域。如果我们能从历史编纂学的原则出发，将这个文会的由来与其发展情况和其所起作用做一个详尽的研究，无疑对汉学史是一个有益的贡献。

本书所做就是这样一个贡献，其初稿则是王毅的博士论文。本来做好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时间，三年一般是不够的。最好能够将硕士与博士连续起来，以四五年甚至五六年功夫连续做一个题目，才能做得出色。但王毅硕士阶段不在复旦大学，做的是民国财政史的研究，我认为这个题目继续做下去成果不会显著，就给他建议两个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有关的题目，他选择了这一个。这是要有点毅力与韧劲的，因为他要面对数量巨大的外文资料，光是阅读理解就要花去大量的时间，尚且不说整理排比的功夫。但他竟然在两年半（头半年几乎都忙于应付公共课）不到的时间里，就做出来一篇答辩委员都公认优秀的论文来，连我都有点吃惊。有的答辩委员还半开玩笑地问，你们何以敢选择工作量这么大的题目？王毅拙于言词，但勤于用功。第一年过去，他的一位同学不无担心地说，我看他有点悬。再过半年，那位同学又说，现在只看时间的多少了，时间充裕论文可以写得长些，时间不够就写得短些，但无论如何都会是一篇好文章。的确，如果我们的博士生学制是四年，这篇论文肯定还要更周全些。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论文也是要一篇一篇做的。既然汉学史研究还有许多空白要填补，我们这一两代人不妨做些踏踏实实的学问，累积一些基本的资料，让以后更聪明的人以之为基础来作更深邃的哲学思维。

孔圣人尚且述而不作，何况我们呢？

绪 论

一、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本课题研究与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及西方汉学史研究均有学术上的关系,因此,在展开本课题研究之前,必须对这两种专门史的研究现状作一番学术上的回顾。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就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而言,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对相关的思想、学说、流派、人物的论述,^[1]而对机构等实体的研究则很少;同时,以往更多的是对学术交流的研究,而缺乏对文化交流模式的注意。近代国门被打开以后,各殖民地宗主国在华建立了为数不少的各种文化机构,这些文化机构固然是列强侵略的产物,但客观上也不免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实体。因为外来文化机构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载体,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文化,同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向西方传播着中国的文化。这些文化机构,就类别而言,有教会、学校、新闻、出版和其他社会文化机构;就性质而言,有专门服务于殖民侵略的,也有从事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就功能而言,有单一的,也有综合的。在文

[1] 主要论文有: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兼评〈剑桥中国晚清史〉关于基督教在华活动的论述》(《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徐明德的《明清来华耶稣会士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梁碧莹的《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李志刚的《马礼逊与中西文化交流》(见李志刚:《百年烟云,沧海一粟——近代中国基督教文化掠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3页),卓新平的《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古代文化》(《世界宗教资料》1990年第2期),陶飞亚的《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罗志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王立新的《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2期),谭树林的《卫三畏与中美文化交流》(《齐鲁学刊》1998年第6期);专著则有: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American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James M. McCutcheon,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Missionary Concep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9.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罗秉祥、赵敦华的《基督教与近代中西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顾卫民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这些研究还是局限于几个著名历史人物的身上,而且也是以他们在华的活动为主要内容,文化交流之具体影响探讨得还比较薄弱。

化交流方面,这些文化机构的效能并不比人物、思想、流派的影响小。像广学会,它在近代出版了许多中文西学书籍,对“西学东渐”就有所贡献。对于教会、学校、新闻、出版等比较专门的文化机构,学界已有所论述,^[1]但是对于综合性的文化机构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论著。因此,本课题选择一综合性的文化机构作为考察对象,以期通过对该机构作具体的微观分析,能够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文化地理研究方面作出新的探索。

本课题选择的这个综合性的文化机构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即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以下简称文会),它是近代外侨在上海创建的一个公共文化机构,旨在“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它组织完善、目标明确,在近代独此一家,并以其图书馆、博物院和大量的会员,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交流媒介。因此,对于该机构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以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不足,而且可以拓展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领域,掘进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深度,也有助于认识文化机构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

专门论述文会的文章十分有限。日本的小竹文夫最早对文会图书馆当时的馆藏书籍做了初步的介绍,列出了比较有价值的馆藏东方学图书。^[2]1933年,胡道静对文会博物院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基本上勾勒出了文会博物院的发展历程。^[3]1988年,奥特尼斯(Harold M. Otness)对文会图书馆的历史、藏书量做了简单回顾,但未谈及馆藏书籍之构成、来此借阅的读者、图书馆的有关活动和图书馆在近代

[1] 教会方面的论著有: D. Willard Lyon,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895;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W. N. Lacy, *A Hundred Years of China Methodism*, New York 1948; Wallace C. Merwin, *Adventure in Unity: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Grand Rapids, Mich.: Eerdmans, 1974; Iron T. Hyatt, Jr., *Protestant Mission in China 1877 - 1890*, Papers on China, Vol. 17., 1963; Kimberly A. Risedorph, *Reformers, Athletes and Students, The YMCA in China 1895 - 1935*,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4; 学校方面的主要论著有: John Z. Bowers,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 - 1951*, Philadelphia: The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72. Brian Harrison, *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 - 19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 - 1951,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 - 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章开沅主编的《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王立诚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其他文化机构的主要论著有: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being a jubilee retrospect of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ith sketches of other mission presses in China, as well as accounts of the Bible and Tract societies at work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2] (日)小竹文夫:《上海の英国亚细亚学会北支那支会图书馆》,见东亚同文书院支那研究部:《支那研究》第十九号,昭和四年(1930年)五月发行,第313-342页。

[3] 胡道静:《上海博物院史略》,《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391-412页。见《民国丛书》第四编第81辑,上海书店 1993 年版。

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1] 1996年,张海林初步论述了文会的活动和《会报》的内容,但是由于所见材料的限制,还欠准确。^[2] 此外,在有关新闻史及其他论著中也曾见到关于文会的介绍,但这些介绍在学术上意义不大。^[3] 可以说,前此关于文会的研究成果均系介绍性的,而且由于写作时间和所见材料的限制,这些文章对文会的介绍还欠准确,对文会的组织结构、会报、会员、活动、博物院的情况至今未有研究性的论述,文会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更无人论及。

文会设在上海,处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最前沿,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以往有关上海史的研究论著几乎未对文会做过深入研究,遑论文会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意义。1921年,兰宁、库寿龄撰写的《上海史》和1937年岑德彰编译的《上海租界略史》对该机构的描述寥寥不到百余字。^[4] 20世纪30年代编纂的《上海通志馆期刊》也只是在“上海图书馆史”中对文会图书馆做一简单介绍;^[5] 1999年,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对文会图书馆和博物院也专门予以描述,^[6] 在准确性、全面性方面都较以往论著有所突破,但基本上仍处于介绍的层面上。因此,对该机构的研究,也有望填补上海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文会在致力于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的同时,也提出“为汉学提供令人满意的研究成果”。该机构存在期间,不仅从事中西文化交流的活动,而且也为近代国际汉学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对该机构的研究也有助于对近代国际汉学发展的全面理解。

就近代汉学发展史研究状况而言,1933年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

[1] Harold M. Otness: *The one bright spot in Shanghai: A history of the Library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Vol. 28, 1988.

[2] 张海林:《上海亚洲文会述论》,《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 这些介绍详见: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民国丛书》第二编49辑,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87页;郭卫东主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叶再生的《中国近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日)山口昇编的《欧米の支に於ける文化事业》,佐原研究室出版,上海日本堂发行,大正十年(1921年);石田干之助的《欧米人に於ける支那学の現況》,东亚同文会调查编辑部编《支那》,1929年7-9月号;满铁上海事务所编的《上海アヅア学会北支那支部の杂志编辑主任 Gale の記事》,《满铁调查资料》,第十一所揭,昭和七年十二月;姊崎正治博士的《欧米人の东洋学现况》,东亚同文会发行《支那》,昭和八年十二月号;石田干之助的《欧米人に於ける支那研究》,东京创元社昭和十七年(1942年)刊行,第105-112页;

[4] George Lanning & Samuel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Ltd., 1921. pp433-434. 岑德彰编译:《上海租界略史》,劝业书局,1937年版,第112页。

[5]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通志馆期刊》第2卷第4期,第1399-1401页。

[6] 《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205-206页。

(上海书店)和1942年石田干之助的《欧人之汉学研究》(东京创元社昭和十七年刊行)基本上勾勒出了20世纪以前汉学发展的脉络。此后,大陆学界的汉学史研究一度沉寂,港台地区部分学者则继续了在该领域的研究。60年代,陶振普等人论述了英、美、法、德、意、日、越、荷、瑞典等地的汉学发展简史。^[1]1975年香港又再版了李璜早年翻译沙畹的《法国汉学小史》(香港珠海学院出版委员会1975年)。^[2]80年代以来,大陆之汉学史研究再次热起来,涌现了不少的论文和专著。^[3]这些研究成果几乎复原了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汉学发展之简史,涉及到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主要论著和部分汉学研究机构,但深入论述还是主要集中于明清时来华的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他们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贡献,对近代西方汉学史研究还有待于深化。

文会是近代的一个重要汉学机构,文会所发行的《会报》也是著名的汉学期刊,其图书馆收藏的书籍多数是关于中国的西文图书,但是上述汉学史的研究对这个位居东方的汉学重镇却言之寥寥,因此,对文会的研究不仅可弥补一项汉学研究的空白,而且也有望能开辟汉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综上所述,对文会做深入分析和研究,不仅可弥补汉学史与上海史研究的一项空白,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推进和深入对中西文化交流史

[1] 陶振普等著:《世界各国汉学研究论文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8年版。

[2] 《法国汉学小史》最早出现于李璜所译格特勒 M. M. (Grant, M. M.) 之《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中华书局1933年版)。

[3] 主要论著有:(法)于阿尔等著、耿昇摘译的《十八世纪法国对中国科学与工艺的调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4期),许敏的《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史学集刊》1992年第1期),吴孟雪《明清欧人对中国文献的研究和翻译》(《文史知识》1993年第6、7、9期),吴孟雪《明清欧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介绍》(《文史知识》1994年第7、8、9期),郑天星的《传教士与中西西渐: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为中心》(《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2期), (法)戴密微的《法国汉学研究史》(见[法]戴仁主编、耿昇译的《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页),阎纯德的《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议》(《汉学研究》第一集), (美)韩大伟的《西方古典汉学史回顾:传统与真实》(《清华汉学研究》第三辑),戴密微的《法国汉学研究史概述》(《汉学研究》第一集),吴孟雪的《中西西渐的第一页——16世纪欧洲汉学概况》(《汉学研究》第一集),钱林森的《法国汉学的历史与现状》(《汉学研究》第二集),熊文华的《荷兰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二集),《俄罗斯的汉学研究》、《瑞典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三集),马树德的《汉学和中国文学在德国》(《汉学研究》第三集),张国刚的《从外交译员到汉学教授》(李学勤主编的《国际汉学漫步》(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38-865页), (德)傅吾康著、陈燕、袁媛译的《十九世纪的欧洲汉学》(《国际汉学》第七辑), (法)巴斯蒂著、胡志宏译的《十九、二十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国际汉学》第八辑),胡志宏的《西方早期汉学发展脉络》(胡志宏的《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一章),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专著则有:张静涛的《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计翔翔的《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吴孟雪、曾丽雅编的《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法)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庆的《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刘正的《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阎宗临的《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的研究。而且,文化的传播、扩散与文化交流本是文化地理的研究对象,本选题同时也属于历史文化地理的范畴。此外,该机构对中国历史和地理也作了大量调查和深入研究,因此对该机构的研究无疑也可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

由于本课题是对文化机构作具体、微观的研究,以往的一些研究文化机构的学术成果对本课题也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具体如下:

斯蒙德斯(Stuart Simmonds)、狄格拜(Simon Digby)等人合著的《皇家亚洲文会:它的历史及宝贵财富》是一册追溯大英皇家亚洲学会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发展历史的论文集,^[1]该书对大英皇家亚洲学会发展历史之回顾、所藏珍贵文物之论述、重要人物之贡献等部分的内容为本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借鉴作用。

英国的亨利·莱昂斯根据理事会会议记录论述了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自15世纪到20世纪间从筹建、发展到成为科学学会的发展历程,并对不同时期皇家学会的会员之身份、数量及参与英国皇家学会之活动热情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2]该书为本研究分析文会的理事会和广大会员提供了思路。

美国的R. K. 默顿通过对17世纪英国的科学发展的研究,探讨了社会、文化与科学之间相互影响的模式以及促使科学研究课题转移的社会原因。^[3]书中对英国皇家学会的论述和《哲学会报》所刊文章的分析为本研究分析文会会员研究课题的转移也提供了借鉴。

台湾的陈以爱通过对北京大学国学门这个研究所发展历程的回顾,论述了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从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变过程,指出了学术研究的组织化、制度化和专业化在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作用。^[4]该书为本研究论述“文会与近代国际汉学”提供了一定的启迪。

此外,还有数篇关于文化机构的论文在不同程度上也启发了笔者的

[1] Stuart Simmonds and Simon Digby,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its history and treasures*, Leiden: Published for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by E. T. Brill, 1979.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已有文献都习惯翻译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或“大英皇家亚细亚学会”,简称“大英皇家亚洲学会”。本书中将“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翻译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而不是“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这是有原因的,正文部分对此有解释(详见14页)。

[2] (英)亨利·莱昂斯著、陈显贵译,《英国皇家学会史》,云南省机械工程学、云南省学会研究会1985年版。

[3] (美)R. K. 默顿著、范岱年、吴忠、蒋效东译:《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Robert K. Mert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Howard Fertig, 1970),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之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思路,它们是:张寄谦的《哈佛燕京学社》(《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董作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2卷1期)、史复来的《〈燕京学报〉前四十期述评》(《燕京学报》第1期,1995年)、王立新的《晚清在华传教士教育团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张静的《广学会与晚清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教学》1997年第11期)。

二、资料来源

1. 与文会直接相关的报刊资料:《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皇家亚洲文会中国支会纪要》(Transactions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租界工部局年报》(Municipal Council, Report for the year 1870-1941)。

2. 近代西文汉学期刊:主要有《通报》(T'oung Pao)、《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中国评论》(China Review)、《哈佛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远东博物院集刊》(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远东季刊》(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华西边疆研究会会报》(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中国科学与美术杂志》(The 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 Arts)、《美国东方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报》(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这些期刊主要是英、美、法、德等欧美国家创办的研究中国及东亚的学术杂志,这些期刊多多少少都记载有关于文会的信息。

3. 民国年间国人创办的学术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国学季刊》、《史学消息》、《燕京学报》、《清华学报》、《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中法大学月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等。

4. 档案:文会的原始档案尚未整理和公布,笔者只是参阅了1952-1956年上海市文化局接受亚洲文会的数件档案,这些档案提供了文会移交给中国政府的时间和当时文物标本之状况和数量。虽然未能参阅原始档案,但依据现有资料能够对文会进行较为完整的研究。

目 录

序 / 1

绪论 / 1

第一章 创建与发展 / 1

第一节 创建背景 / 1

第二节 发展历程 / 14

一 初创时期(1857 - 1861) / 14

二 重建与发展时期(1864 - 1910) / 17

三 兴盛时期(1911 - 1941) / 23

四 结束时期(1946 - 1951) / 27

第二章 组织机构 (一) / 28

第一节 理事会 / 28

第二节 会员 / 33

一 国籍与身份 / 33

二 会员级别 / 36

三 会员与文会 / 40

四 会员的分布 / 42

第三章 组织机构(二) / 47

第一节 图书馆 / 47

一 馆藏书籍 / 47

二 图书馆之利用及评价 / 57

第二节 博物院 / 60

一 发展历程 / 60

二 藏品与陈列 / 64

三 活动 / 72

第四章 日常活动 / 78

第一节 例会和年会 / 78

第二节 演讲 / 79

第三节 《会报》 / 82

一 发行 / 82

二 《会报》内容 / 84

三 《会报》影响 / 89

第四节 其他活动 / 97

一 国际交流活动 / 97

二 国内活动 / 100

第五章 对华调查研究之动态分析 / 105

第一节 时间变化 / 105

一 在关注点上,对中国内政从有所关注发展到不再关注 / 105

二 由调查走向研究 / 109

第二节 空间差异 / 119

一 不同国家会员对华之调查研究 / 119

二 时空差异分析 / 139

第六章 亚洲文会与中西文化交流 / 150

第一节 亚洲文会与近代国际汉学 / 150

一 研究领域 / 151

二 研究机构 / 156

三 汉学研究工具书及相关资料的编纂 / 158

四 人才培养 / 161

五 研究方法 / 162

第二节 亚洲文会与西学东渐 / 162

一 学术研究方面 / 163

二 社会方面 / 166

结语 / 170

附表

亚洲文会历次演讲目录 / 182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表 / 207

参考文献 / 404

后记 /414

表 目

- 表 1-1 19 世纪 50 年代五口与香港外侨人数统计表 / 3
- 表 1-2 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细亚学会支会表 / 8
- 表 1-3 文会英文名不同之中文译称 / 13
- 表 2-1 文会历任会长 / 30
- 表 2-2 文会可考会员之综合信息表 / 33
- 表 2-3 文会名誉会员表 / 36
- 表 2-4 各类会员的历年年度构成统计表 / 40
- 表 2-5 文会各类会员投稿信息统计表 / 41
- 表 2-6 文会会员所及世界各地的时间表 / 42
- 表 3-1 文会图书馆各类图书历年馆藏量 / 48
- 表 3-2 博物院历任院长 / 61
- 表 3-3 博物院展柜所展之标本 / 70
- 表 3-4 博物院历年举办的艺术品展览 / 74
- 表 3-5 博物院举办的博物学讲座 / 76
- 表 4-1 《会报》文章来源统计表 / 84
- 表 4-2 《会报》内容分类统计表 / 86
- 表 4-3 20 世纪中外期刊转载、引用《会报》情况表 / 92
- 表 4-4 20 世纪世界各地曾经收藏《会报》的图书馆 / 96
- 表 4-5 文会交换机构国籍分布统计表 / 99
- 表 4-6 文会交流机构类别统计表 / 100
- 表 4-7 文会出版之书籍(一) / 101
- 表 4-8 文会出版之书籍(二) / 102
- 表 5-1 文会演讲、发表文章分类统计表 / 116
- 表 5-2 文会对中国的货币研究文章 / 117
- 表 5-3 英国籍会员文章类别及篇数表 / 120
- 表 5-4 英国籍会员语言研究篇目表 / 127
- 表 5-5 美国籍会员文章类别及篇数表 / 131
- 表 5-6 文会会员在华游历观察内容之时空表 / 139
- 表 5-7 文会会员在各省最早居住地点时间表 / 143
- 表 6-1 文会帮助或参与创建的汉学机构 / 156
- 表 6-2 会员翻译的文章篇目 / 159
- 表 6-3 20 世纪各国发行的汉学期刊 / 165

第一章 创建与发展

第一节 创建背景

探索异质文化是人类的本能。自古以来,中国在努力认识域外的同时,其他民族也在关注着中国,由此衍生出了绵延不绝、蔚为壮观的中外文化交流。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而言,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相关的记载。真正来到中国,并对中国有较为丰富的感性认识的是 13 世纪的马可波罗,但“汉族两千多年的传统教化,他是知道得不多的”,^[1]后来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也只能算是沿途的见闻,还谈不上研究。

15 世纪新航路开辟后,东西方之间的交通已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伴随着殖民者东进的步伐,西方开始了对中国更为直接的探索与考察。首先东来的是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的传教士,由于明初的海禁政策,他们一直未能踏上中国土地,因此,整个 15 世纪“欧人关于中国之所认,非旅行之见闻,即事业之报告,距研究之域尚远”。^[2]

16 世纪西方开始其全球的扩张运动,基督教参与了这场运动。在中国,传教士们先于殖民者叩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1540 年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创建耶稣会(Jesu Societas),^[3]1549 年即派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东来传教。然而沙勿略“壮志”未酬身先死,1552 年病逝于中国南部沿海的上川岛。1578 年,耶稣会又派利玛窦东来传教。利氏在华 28 年,深刻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

[1] 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转引自林德典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文学语言卷),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6 页。

[2]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 1989 年版,第 60 页。

[3] 本研究中的外文人名、专名之中文译称主要来自:黄光域编的《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的《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也有少数译称来源于其他资料中,鉴于比较分散,将不再一一注明。

想使中国人信基督教,首先要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他在实践中开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即说汉语、读典籍、着儒服、奉华俗的“适应”策略。传教的过程中,利玛窦(Matteo Ricci)、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卫匡国(Martin Martini)、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深入观察了中国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较之以前都有所突破,有人称他们为“近代史上的第一代汉学家”,^[1]他们的著作和书简集大大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了解。16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省份、周边国家都有了比较具体而准确的记载;语言文字方面也出现了中外对照的字典,学者们初步具备阅读汉语文献的能力,也开始了对中国的思想、制度、文化的探讨。

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较以前有很大深入。在开明运动、重农主义、开明专制的政治讨论、百科全书运动中,西方都曾用中国文化作为材料以表明观点。一些启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鸠、伏尔泰和亚当·斯密也认真审视中国的古老文明。伏尔泰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在英国人眼中,中国已有了个性,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既有亲善的,也有反对的,亲善者肯定中国的古代文明和科技,比较认同中国的自然宗教方式;反对者主张世界有神和进步,反对中国无神论和凝定的世界观”。^[2]

由于18世纪发生了“礼仪之争”,中外双方都禁止传教士来华传教,致使19世纪初“西方在华传教事业非常糟糕,1810年中国境内只有31位欧洲教士。北京的传教中心地位几乎已经荡然无存,1838年葡萄牙教士毕学源(Gaetano Pirès-Pereira)去世后,北京城内已无西洋传教士,利氏所开创的传教中心自此消失”。^[3]

“礼仪之争”延缓了西方人直接了解认识中国的进程。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除了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外,西方与中国几乎中断了交往。直到19世纪30年代,中国沿海才出现寥寥几位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近一个世纪中,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基于此前耶稣会士的报告和专著,没有新的调查资料和文献,这自然使得这个时期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他们了解的中国文化基本上限

[1]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2页。

[2] 陈受颐:《鲁滨孙的中国文化观》,《岭南学报》1卷3期,第30页。

[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New York, 1929. pp180-181.